

一首宋诗解唐谜

王学礼

一代女皇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人(今属吕梁市)。其父武士彟，乃唐朝开国重臣，病故后归葬故里。唐天授元年(690)九月九日，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后，尊其父为太祖孝明高皇帝，次年春二月，追封文水父亲墓为太上皇帝陵，尊为“昊陵”，咸阳母亲墓为“顺陵”；还敕将故乡的武氏家庙庄院捐于佛门，扩建为传播大云经的寺院，名为“寿宁”。

唐圣历二年(699)，武则天改署文水昊陵为攀龙台，咸阳顺陵为望凤台；对昊陵按照皇陵标准进行了扩建。时隔一年多的唐长安元年(701)十二月，78岁的武则天又在攀龙台立了一通非常高大的“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”，俗称攀龙台碑，碑文由宰相李峤撰文，时为相王的唐睿宗李旦书写，长达6700字，较详细地介绍了武士彟的一生经历与武氏家族的起源。

遗憾的是，武士彟的昊陵和碑早在明代中期就不见了。明朝《永乐大典》卷5204载：唐武士彟墓在文水县城北十里，唐则天皇后父也，则天革命改墓曰陵，旧有碑二通，太宗碑高宗碑并书，今已不见。只有高皇帝碑，高五丈，阔九尺，厚三尺。其碑地埋一半，文亦剥落，只有碑额‘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’。距今最近的光绪九年(1883)《文水县志》“古迹”：“攀龙台，武则天后父荆州都督武士彟墓也。则天时，追封周高祖，名坟为攀龙台。敕李峤撰记，其文六千余字，甚佳。见《文苑英华》。”在“丘墓”一题下仅有短短的一行：“唐，荆州都督墓，武后父，讳士彟。未详所在。”

前不久，我查找资料的时候，意外地在北宋官员吕陶的《净德集》中发现了《游文水寿宁院》一诗：

“重岩一水源何长，下浸十项同江乡。环堤数里植垂柳，绿阴交盖西风凉。危桥迤逦渡前岸，古寺直枕山之冈。门闕闭邃庭闈，金碧间斗皆煌煌。并人事佛素已深，挟以富力尤辉煌。三朝宸札所赐，奎文宝室人间藏。如有方丘处厚地，镇压万众传无疆。西园嘉卉不知数，春晖尽许开琳琅。东偏小池亦足爱，秋色未老芙蕖香。寺旁有曰武陵者，高碑大字言其详。武周一旦改唐祚，天倾地转无乾纲。睿皇碑书李峤记，当时气焰安可量。神功距此四百载，孤坟虽在郊原荒。年年秋潦过坟侧，枯尽白草空斜阳。且怜景物为一饮，谁暇对酒论兴亡。”

吕陶，字元钧，号净德，眉州彭山(今属四川)人，宋仁宗皇佑年间进士。他的一生，既有皇帝身边记载言行、起草诏令的宫廷生活经历，又与王安石、苏轼、司马光等朝中重臣有过同朝为官参议政事的经历。《宋史》中有传。著有《净德集》。

《游文水寿宁院》中说：“神功距此四百载”，“神功”是

武则天大周时的年号，使用时间为神功元年(697)十月至圣历年(698)正月。所以，吕陶游文水寿宁院时间大致为四百年之后的公元1097年秋冬之际，这首诗为吕陶知潞州时，因事途径文水游寿宁寺后的感发。

这首诗记述了他此次游访文水寿宁寺的所见所感。诗的开头写了寿宁寺的位置和环境，富丽堂皇的建筑以及院内景致；后半部分由自然景观写到人文景观，从攀龙台碑的气势之胜又转到今日来游的凄凉之景，写出了兴衰交替、沧海桑田的历史之变。

寿宁寺旧址，位于文水柏荀山脚下，占地约五十多亩，是在武士彟“武氏家庙”的基础上，扩建起来的一处寺院。武氏家族是从六代祖武治于北魏初年迁居文水徐村的。武治是北魏的平北将军、五兵尚书，曾封为晋阳公。武士彟祖父武俭，曾任北周永昌王咨议参军；父亲武华，曾任隋东都丞。

《游文水寿宁院》开头写道：“重岩一水源何长，下浸十项同江乡……”写出了寿宁寺的优美环境；“门闕闭邃户庭闈，金碧间斗皆煌煌……西园嘉卉不知数，春晖尽许开琳琅”，就是在写寿宁寺的富丽堂皇。四百年过去了，吕陶从地处高冈的寿宁寺望去，寺院旁的昊陵墓区内，“睿皇碑书李峤记”的攀龙台碑十分醒目。

诗句中“寺旁有曰武陵者”，是说昊陵就在寿宁寺一侧。但是，昊陵究竟在寿宁寺的哪一侧？攀龙台碑在寿宁寺的哪一旁呢？《永乐大典》卷5203“寺观”记载：“寿宁寺……去武士彟墓三里。”除这一句文字记载外，还在文水地图内标了武士彟墓的位置，大致在“寿宁山”东南方向、文峪河“徐村桥”的不远处。图上画的也不是墓，而是上写“后碑”的一块碑。我认为，“因山为坟”的“墓”一定在西山脚下，《永乐大典》所说离寿宁寺三里的“墓”，是指攀龙台碑。

2011年，在文水县北徐村则天庙正东1.3公里南300米处，当地村民在距地表15米深的地方，挖掘出了整体高度达4.56米、重达22吨的一对大石狮。两座石狮一南一北，相隔约60米，坐西面东，蹲式姿势，神态威武，具有明显的唐狮特征。经专家考古确认为昊陵神道的石狮，石狮成为考证攀龙台碑最有力的参照。

有了石狮出土位置参照，2012年文水县再次启动攀龙台碑的勘测工程，从石狮出土处开始，在以100米为宽、正西直至西山2.5公里为长的区域内，进行了地毯式勘测，遗憾的是，勘测无果而终。

我认为，目前寻找昊陵的所有努力，都没有离开以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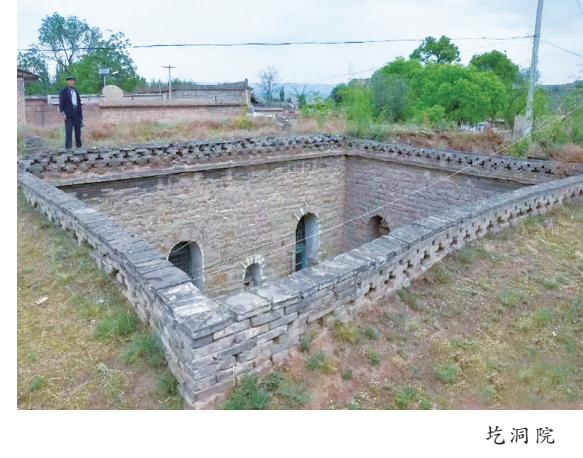
现藏文水县则天庙内的昊陵石狮

天庙为中心的范围考量。读到《游文水寿宁院》一诗后，吕陶以寿宁寺看昊陵的视角以及昊陵“犹在旁侧”的信息，给了我启示。依昊陵应有的规模，它和顺陵一样应该也有四门，“因山为坟”的坟墓只能背靠西山，以西为正，所以一对石狮子的位置应该就是朱雀门。既然吕陶亲眼所见武士彟墓在寿宁寺的“旁”“侧”，按照西山走势和寿宁寺地形，墓穴只能在寿宁寺西偏南大约500米的山脚处。此处与石狮出土处两点连线有两公里左右，如此作为神道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攀龙台碑只能出现于现在中舍村的东面偏南，此地则在则天庙正东0.7公里左右的样子，直线距离寿宁寺大约1.5公里的样子。这也与《永乐大典》记载的距离和方位吻合。

“年年秋潦过坟侧，枯尽白草空斜阳。”这一带每年秋季都会久雨不断，山洪大水就会从陵墓侧畔流过。是啊，每年夏秋间总泡在一片汪洋中的攀龙台碑，近千年的风雷激荡、沧海桑田，难免有沉沦的一天。

寿阳圪洞院

郭宗敏



圪洞院

“看去不见村，入村不见人，平地起炊烟，忽闻鸡犬声。”这句话形容的是黄土高原上的一种古老民居——地窨院。在晋中市寿阳县西洛镇南东村南，大约有20余处地窨院，且各具特点。

地窨院也叫地坑院、天井院，村里的人们叫做圪洞院，有几处圪洞院保存完好，现在还有人居住。这种院子十分奇特，走近，会看到地面有一个大方洞，从里面隐

隐传出说话声、鸡犬声。站在坑上边，便可将院内情形一览无余。大方洞里有窑洞样的房屋，布局有点儿像北京的四合院。与北京四合院不同的是：一个在地上，一个在地下；一个需要各种砖、瓦、木材来搭建，一个只利用当地的黄土便可建成。

我找到一处圪洞院，但在院子四周走了一圈，却不见入口。这时，一位村民将我领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入口，通过一条狭长倾斜的地道式门洞，进入圪洞院。

走进院里，抬头观望，只见蓝天被“切”成了正方形，颇有坐在方井观天的感觉。正面窑向阳，供人居住，侧面窑背光用于堆放杂物和圈养牲口。窑洞的门上装有天窗，便于通风，窑洞内四季温差小，冬暖夏凉，非常适合居住。圪洞院里掘有渗水井，用来积蓄雨水，避免雨天院内积水，雨水沉淀后可供人畜饮用。院内还挖有旱井，用于排放生活污水。此外，窑顶坡度向院子外倾斜，窑顶的水不会流入院子里。

至于为什么要建圪洞院，主人说古时候人们穷，这里石块和木材稀缺，而建造圪洞院主要靠劳力，挖个坑打个洞，一个圪洞院用不了几年就建成了。

圪洞院的设计非常科学，院顶周围地面是空旷的场地，可用来摊晒粮食、堆放柴草。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，圪洞院构成了一个完备的生产生活场所，是一种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居住形式，也是人类早期“穴居”发展演变的实物遗存。

春秋后期，晋国的势力达到了太原盆地北部。公元前541年，晋国的军队在卿大夫中行穆子的率领下，“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”(这时的太原是一个区域概念，不是一个城邑名称)，把戎狄的势力驱逐出太原地区，晋国开始在太原地区站稳脚跟。

在这次太原之战前，晋国和中原其他诸侯国都是以车战为主。太原之战前夕，晋军将领魏舒根据实际情况，提出把车兵改为步兵的建议，“请皆卒，自始”，即“纯用步兵，从我们开始”。晋军统帅采纳了魏舒的建议，“毁车以为行”，改车兵为步兵。晋军把车兵改为步兵，对打败戎狄的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这次战役之后，步兵作为一个常设的兵种正式在晋国的军队中出现。在中原各国中，晋国是最早组建步兵的国家。由此看来，太原之战也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单纯步兵对阵的战役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晋国的势力在太原地区站稳脚跟后，以太原地区为根据地，不断向东、西、北三面的戎狄进攻，拓展疆土。晋国六卿之一的赵简子在参与晋国的对外拓展活动中，看到了太原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，便把太原地区确定为赵氏家族发展壮大的战略中心，派他的家臣董安于在此修建城堡，于是就有了今天太原的前身——晋阳城。

公元前458年赵简子死后，他的儿子赵襄子继续以晋阳城为依托，北上消灭了代戎。公元前455年，掌握晋国实权的智伯胁迫韩、魏两家向赵氏发起进攻，赵襄子率兵退守晋阳城，智、韩、魏三家联军包围了晋阳城，晋国四卿之间的晋阳之战爆发。晋阳城久攻不下，智伯便引水灌晋阳城，城中悬釜而炊，情况危急。赵襄子的谋士张孟谈主张利用韩、魏和智氏的矛盾，联合韩、魏反智氏。韩、魏两家本来就不愿出兵围攻晋阳城，更担心智氏消灭赵氏后接下来会对他们两家下手，便答应倒戈。公元前453年三月的一天，韩、魏、赵三家的军队共同对智伯的军队发起进攻，智伯兵败被杀，智氏的土地和人口被韩、赵、魏三家平分。

军事重镇晋阳城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，就以极强的防御能力令人惊艳。

又过了15年，韩、赵、魏三家看到新即位的晋幽公软弱无能，便又平分了晋国新都和旧都之外的其他地方。晋阳之战后50年，韩、赵、魏三家要求周天子封他们为诸侯，周威烈王便送了个顺水人情，正式封韩、赵、魏三家为诸侯，韩、赵、魏、秦、齐、楚、燕七强并列的形势正式形成，史称“战国七雄”。七强并立的格局在晋阳之战结束时就已经开始。晋阳之战为三家分晋铺平了道路，奠定了战国七雄并立的格局，是春秋战国之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重大战役，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。

三家分晋后，晋阳是赵国初期的都城。后来，赵国为了适应新的军事、政治形势，把国都迁往太行山以东。迁都之后，晋阳城仍然是赵国的军事重镇，是赵国北伐三胡、西抗强秦的前哨阵地。在战国初期、中期，晋阳城在赵国和列国争雄的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，当时的人们把晋阳比喻为赵国的柱石。

秦庄襄王二年(前248)，秦军攻占晋阳。顾祖禹认为，此乃赵亡之始。20年后，秦军大将王翦率大军从晋阳东出太行山南下邯郸，赵国灭亡。



铁面御史乔应甲

杜流程 贾莉菲

楹联颂廉洁

乔应甲为官35载，一生著作颇丰，计有《便民政事》《三实奏章》《看山集》《难焚草集》《咫园诗集》等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楹联文集《半九亭集》。

《半九亭集》共8卷，收录了作者4020幅楹联，因其数量之多，涵盖之广，警示醒世意义之深刻，后人广为传诵。《半九亭集》其中的《为官四条》“律己以廉、扶民以仁、存心以公、莅事以勤”，后世奉为从政的信条。从乔应甲楹联中的为官为人观，不难看出，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，在给我们以训示、教诲的同时，更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滋养。

骑驴行天下

在乔应甲的传奇故事绘画中，很多都是乔应甲牵着毛驴或者骑着毛驴的画像。一位明朝重臣，为何不坐高抬大轿，却与毛驴同行？因为乔应甲微服出巡从不坐高抬大轿，也很少带随从，总是穿个大褂，骑个毛

驴，走在田间地头，为百姓排忧解难。

乔阁老的民间传说很多，其中有一个“毛驴坐轿”的故事广为流传。一天，乔阁老骑着毛驴在蒲州一带私访时，看到路边有一对母女在号啕痛哭，追问之下，才了解到这家的女儿被当地横行霸道的财主张虎看上，第二天就要娶回家。听到此，乔阁老一番思量，劝母女俩安心回家，说自己定会还母女俩一个公道。

第二天，张府里张灯结彩，花轿到门前，张虎掀开轿帘一看，轿里竟是一头被绑着蹄子的毛驴。下人递来一封书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欺压百姓实可憎，抢占民女更难容。毛驴陪郎把堂拜，何去何回任尔行。乔应甲。”碰到秉公执法的乔应甲，张虎吓得魂不附体，忙命家人随他去送驴赎罪。

铁面立官威

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，还有乔阁老杖毙曹国舅的故事。

曹国舅本名曹应祥，是当朝曹太师的儿子，仗着皇亲国舅的身份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

时逢乔应甲奉旨巡抚陕西，众多百姓知道后纷纷拦路喊冤，张张状纸告的都是同一个人——曹应祥。

乔应甲对这些诉状逐一审视，随后，他身着便装，深入百姓，挨家挨户私查暗访。在掌握大量的铁证后，乔应甲立即命捕快将曹应祥捉拿到案。

巡抚大人捉拿曹国舅一事，令陕西官员大为震惊，于是纷纷来说情。面对此情此景，乔应甲说：“朝廷设官，原以为民，这‘为民’二字何重！吾看小民之冤屈，何忍做那不仁不义，贪赃枉法的父母官！”为怕事情有变，乔阁老即刻下令，在长安城钟楼下公开审判罪大恶极的曹应祥，并将其杖毙就地正法，为长安城除一大害。百姓们纷纷称快，齐呼他为“铁面御史”。

乔应甲大公无私、清正廉明的“铁面御史”形象深入人心，在当代也具有借鉴作用。



晋人物

诸侯国晋阳争雄 李广洁